

厚植正确政绩观的文化根基

李成超

从学理上审视政绩观,它并非孤立的政治主张,而是蕴含着深嵌于文化中的价值表达与行为逻辑。厚植文化根基,对于确保政绩观不偏向、不走样,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性意义。

深挖文化价值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内在支撑和深层力量。这里以民本思想、家国一体、实事求是为例。

(一)民本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民惟邦本”“黎元为先”的古老智慧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政绩的重要评判标准,在于是否真正解决了群众的急难愁盼,是否增进了民生福祉,是否让人民群众拥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厚植文化根基,就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各项决策和工作都紧紧围绕人民利益展开。这正是“为民造福”的要求在政绩观中的生动体现。

(二)家国一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了历代仁人志士深沉的家国情怀,构成中华文化独特的伦理逻辑。它将个人价值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紧密相连,要求社会成员超越一己之私,担当起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新的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以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去创造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实绩。这种责任感,正是家国一体观念在当代的生动体现。这也是“立党为公”的题中应有

之义。厚植文化根基,就要心怀“国之大者”,自觉把工作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考量。

(三)实事求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实事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十五五”开局之际,我们要不断深入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国情和新发展阶段特征,科学设定发展目标,谋划务实举措。应当认识到,任何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行为,都与实事求是的精神背道而驰,最终只会劳民伤财、贻误发展。厚植文化根基,就要坚持实事求是,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涵养理性自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辩证思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有助于党员干部抵御错误政绩观的侵蚀,保持战略清醒。

(一)警惕“速度情结”与“换挡焦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重要文化密码。在政绩观上,忧患意识有助于我们更加审慎地看待经济社会发展的两种倾向。

一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速度情结”,二是在发展进入新阶段、增速换挡时产生不必要的焦虑。厚植文化根基,就要深刻领会新发展理念的实践逻辑,以忧患意识为镜,保持持久耐心和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二)破除“本位主义”与“短视行为”。“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整体思维、大局观念。在现实中,错误的政绩观往往伴随着“本位主义”的倾向,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损害全局利益来换取局部利益;或者表现为“短视行为”,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不愿意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厚植文化根基,就要弘扬大局观念,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的关系,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做到全国一盘棋;要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抓未成之事,多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实事。

(三)抵制“功利主义”与“浮躁心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个人品德修养。“廉者,政之本也。”错误的政绩观背后,往往潜藏着功利主义和浮躁心态的因素。一些人把工作当作博取个人名誉、地位、权力的工具,以搞“短平快”项目和“眼球工程”捞取政治资本。这种心态不仅导致工作不扎实,还可能滋生腐败。厚植文化根基,就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实现文化赋能

(一)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校准发展价值坐标。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树立正确政绩观,应当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用我们自己的价值坐标来衡量发展成效。西方的发展模式有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土壤,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浸润着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厚植文化根基,就要在谋划和推动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从国情出发,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让发展兼具现代文明共性特征和中华文化独特神韵。

(二)弘扬实干精神,让政绩在落实中生发。“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精神早已熔铸为民族血脉的深层基因。真正的政绩生成于扎扎实实的实践之中,而非口号宣示或表象营造所能替代。厚植文化根基,就要大力弘扬实干精神,引导党员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要走进基层、走近群众,在近距离对话中听民声、解民忧;要发扬钉钉子精神,确保“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目标落地生根。

(三)坚持守正创新,在传承中开创新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员干部既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理智慧,又要勇于突破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运用新理念、新科技、新方法解决现实难题。厚植文化根基,就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以守正涵养定力、以创新激发活力,持续创造出回应人民期盼的新业绩。

厚植正确政绩观的文化根基,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工程。我们要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指引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提升思想境界、涵养道德操守、增强履职能力。

以乡村文化空间建设赋能乡村振兴

陈瑶姬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乡村文化馆、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是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重要举措。乡村文化空间作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基层终端,是传承乡土文脉、普及公共文化、培育文明乡风、激活文旅产业、凝聚群众共识的重要阵地,承载着守护乡村文化根脉、活化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厚植精神共富沃土的重要功能。

以分类建设文化空间夯实乡村文化振兴根基

建设乡村文化空间,应注重“规划先行、标准引领、分类施策、错位发展”,避免“千馆一面”。明确分类建设导向,打造“小而美、美而精、有故事、有温度”的乡村文化空间。立足乡土资源禀赋,可参考按照红色传承、非遗技艺、村史民俗、农耕文化、科普教育、特色产业、新时代文明实践七大类型,差异化建设乡村文化馆、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文化礼堂、乡愁馆、非遗工坊等,形成覆盖广泛、脉络清晰的乡村文化服务

网络。在此过程中,可以推动高校、文化馆、文艺院团与乡村文化馆结对帮扶,实施文艺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行动,让文艺人才留在乡村、文化活动办在日常。

以文化空间高效运营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文化空间不仅要建好,更要运营好,要破行政化、强社会化、重群众化,构建灵活高效、可持续的运营机制。一是要探索多样化运营模式。鼓励村集体主导、企业合作、个人创办、机构托管等多种运营方式,形成灵活高效的管理机制。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引导有情怀、有实力的社会主体投身乡村博物馆事业。二是提升体验感与群众参与度。引导群众从“被动看”转向“主动参与”,增强互动性、体验性、实践性。推广“百姓点单、场馆接单、志愿者送餐”服务模式,把文化服务办到群众心坎上。三是健全长效管理保障。建立“站长负责、专人管理、志愿者协助”运行机制,将运行经费纳入财政保障,鼓励社会捐赠、乡贤资助。完善服务评价、绩效考核、激励约束制度,推动乡村文化馆从“建起来”向“转起来、活起来、强起来”转变。

以增强内容叙事能力提升文化传播效能

故土、故乡和故人,是深埋于每个人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随着乡土文化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变化,通过乡村博物馆保存、展示和传承老物件,是当下留住乡愁的重要方式。乡村文化空间的生命力在于见人、见物、见生活。可深入挖掘藏品背后的历史故事、文化内涵与情感价值,通过主题展览、互动讲解、文化沙龙等形式,生动呈现乡村记忆与文化基因,使博物馆成为凝聚乡情、传承文脉的精神家园。要把乡村博物馆建起来,把散落在田间地头、农户乡舍的特色藏品有序收集起来,让群众更加意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比如,湖南长沙铜官窑博物馆通过融合艺术普及、手工业体验、阅读推广、科普教育、民俗互动,打造沉浸式文化场景,实现从“遇冷”到“出圈”的逆袭。同时,通过数字化打破时空限制,让乡村文化空间实现线上可看、可学、可体验、可传播,从而扩大覆盖面与影响力。

以融合发展理念拓宽乡村振兴实践路径

乡村文化空间不是孤立的文化场

馆,而是乡村振兴的文化引擎,须推动“文化+党建”“文化+治理”“文化+产业”“文化+旅游”等深度融合。以文化人培育文明乡风,将文化空间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阵地。以文促治提升治理效能,发挥文化馆凝聚人心、化解矛盾、沟通情感的功能。以文兴产带动富民增收,推动“文化馆+非遗工坊+文创产品+乡村旅游+研学实践”一体化发展,盘活文化资源、培育特色产业、增加就业岗位。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乡村文化空间是乡村振兴的主阵地、主平台、主抓手,是连接历史与未来、城市与乡村、群众与文化的桥梁纽带。坚持以分类建设文化空间夯实乡村振兴根基,以文化空间高效运营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以增强内容叙事能力提升文化传播效能等,必将更好传承乡土文脉、滋养文明乡风、激活文旅产业、凝聚奋进力量,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注入持久而深厚的文化动能。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市委党校特约研究员,中共长沙市委党校教师)

近代文学转型期诗歌的变革及其现代性启示

胡晋菴

近代中国经历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系统性变革,文学也发生了转型。新诗的诞生,是文学转型的重要标志。它打破了传统格律,并在内容与形式上进行了大胆创新。本文旨在探讨新诗的出现以及其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意义。

文化突围与重构

近代中国的变革是系统性的。政治上,战争等因素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动摇了文学依附的礼乐根基;经济上,现代工商业与交通技术的兴起催生了新的描写对象、传播媒介与城市读者群;文化教育上,科举废除与新式学堂设立使文学逐渐成为参与社会启蒙与建构国民认同的公共实践。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的理论;在《今别离》《哀旅顺》等作品中融入了地理新知、科技意象与家国悲情;袁廷梁强调“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主张……这些探索虽未彻底突破格律,却为新文学的诞生埋下了思想伏笔。

从诗界革命到白话新诗的范式转换

新诗历经20余年酝酿,终于在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后实现范式跃迁。该文以“八事”为纲,包括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等。这表明文学不再是“代圣贤立言”的工具,而应回归“言志”本质,成为个体生命经验的真诚表达。1920年,胡适的《尝试

集》作为首部白话新诗集的出版,其历史意义远超文本本身。它以《蝴蝶》《一颗星儿》等作品宣告,诗歌可以不用典、不押韵、不讲平仄,只要准确传递现代人的感官印象与心理节奏。

新诗之新,体现为诗歌语言、形式体裁、精神内涵三重维度的协同转变。首先是语言层面,体现出“言文合一”的特点。白话取代文言,不仅是词汇替换,更是思维语法的重构,更契合现代人对理性关系的精确把握。其次是形式层面,体现出诗体的“自由解放”。新诗改变了古典格律诗严密的形式规定与约束,借鉴自由诗体与象征主义诗体等形式,发展出分行、意象叠加等现代诗的艺术特征。比如,郭沫若的《女神》以火山喷发式的节奏构建出了狂飙抒情的情感主体;闻一多的《死水》通过音尺、视觉排列的形式体现出理性的节奏。二者看似对立,实际上有着同一现代性的诉求,即形式不再服从于外在规范,而是服务于内在情感结构的有机呈现。最后是精神层面,体现在诗魂的“主体觉醒”上。其变革在于抒情立场的转换,从代言转向了个人的表达。比如,诗人在《女神》中发出“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的宣言,是尼采式超人的意志与中国五四青年的生命热情的双重投射;诗人徐志摩善于对存在瞬间的敏感捕捉,他在《再别康桥》中写道“轻轻的我走了”,也凸显出对自我的观照;

戴望舒的诗《雨巷》中“丁香一样的姑娘”的朦胧意象,则隐喻着都市现代性的情感,如疏离、期待、幻灭。

新诗的文学实践与多维辩证

新诗的诞生对于中国文学正式进入现代文学阶段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文学现代性,是在传统资源与外来冲击、民族危机与个体觉醒、启蒙理想与审美自律等多重张力中动态生成的复合体。

首先是语言的现代性。白话诗运动使书写权利从精英阶层走向了大众化,为思想启蒙提供了传播基础。其次是诗歌形式的现代性。闻一多“三美”理论(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表面上承袭西方的诗学体系,实际上是对中国古典声律、意象、结构的创新转化,体现出现代汉语诗歌的美学特征。比如,诗歌《死水》中“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便充满顿挫与凝重的节奏感,诠释了“音乐美”;再如《死水》每行9个字,汉字排列匀称呈现出“建筑美”;而“绘画美”则是诗中融合了色彩的感觉,如《红烛》中的颜色描述:“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最后是诗歌精神的现代性。比如,在郭沫若的诗《凤凰涅槃》中,既有浪漫主义特色,又有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的大义担当,可以说诗中那重生的凤凰既是诗人自我人格的夸张,也是整个古老民族渴望新生的隐喻,排比句式的诗句“我们新鲜,我们净朗,我们华美,我们芬芳”,表达出个体解放与民族复兴之间的紧密联系;李

金发在诗歌《微雨》中写道“我的灵魂是荒野的钟声”“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直接面对了自己的内心感受;还有冰心的作品,开辟了温婉而坚定的抒情之路,在诗歌《繁星》中,她写道:“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将母爱、童心、自然的真挚情感融入其中;穆旦在其诗《森林之魅》中写道:“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也是饱满热烈的情感表达,他还在《赞美》一诗中直面民族的苦难,“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这些表达共同指向一个命题,即文学必须直面人生的生存困境——在传统崩塌后如何安顿心灵?在民族危亡中如何确认自我?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下如何守护文化的根性?

新诗的转变历程不仅解构了古典诗歌的体系,更通过语言的民主化、形式的实验性、精神的个体化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方法论范式。而当下面对人工智能、短视频、消费主义等新的挑战,新诗的启示在于,文学现代性不是对西方的简单模仿,而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寻找属于本民族的文化表达方式。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历经数千年积淀,内涵丰富、底蕴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同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承载着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第二个结合”不仅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遵循,更是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追求、思维方法上存在深刻的契合性,二者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产生深刻化学反应、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伟大创造。

深刻把握“魂脉”与“根脉”的辩证统一关系

要理解以马克思主义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内在逻辑,首先必须准确把握二者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从实践来看,二者的相融共生早已具备深厚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指明了人类解放的前进方向。这一科学真理,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文化传承发展领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我们甄别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把握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提供了重要判断标准和行动指南,可确保文化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或文化复古主义的泥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则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实践中积累的智慧结晶,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文化基因。从“民惟邦本”的治国理念到“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从“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到“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从“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到“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这些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和精神标识,构成了我们文化自信的深厚底蕴。失去这个“根脉”,我们的很多文化实践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魂脉”与“根脉”的结合,是双向奔赴与双向成就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进一步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蕴含的思想精髓跨越时空,不断展现出解决当代问题的独特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沃土,又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丰富的文化滋养,其中国化时代化的表达更加生动、更易为人民所接受。这种结合,既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又彰显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成为引领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结合”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结合”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通过结合,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这也就是一个对传统文化“扬弃”的过程,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科学的辨析与萃取。

首先,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甄别与阐释。一些传统文化元素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不能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也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区分精华与糟粕。比如,我们要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中“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但须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和历史观对其进行提升,将其发展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要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但须将其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之中。这种甄别与转化,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体现。

其次,要聚焦核心思想理念,进行时代化的激活与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重点就在于对于这些核心观念进行现代转换和不断创新阐释。在宇宙观层面,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智慧,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相结合,深刻阐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更多文化支撑。在社会观层面,将“民惟邦本”“为政以德”等理念,同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相结合,深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一步夯实国家治理的文化根基。在道德观层面,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价值理念,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进行通俗化、大众化的诠释和传播,使之成为涵育公民道德、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资源。

再次,要创新表达与传播方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在当下。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王伟王勇

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不能停留在故纸堆和学术论文中,需要让其融入时代脉搏、走进人民生活。要善于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新业态,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和传播渠道。无论是《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等文化节目的热播,还是故宫文创产品的走红,抑或是数字技术让敦煌壁画、古籍典藏“活”起来,都是成功的实践。这些鲜活的案例为文化创新创造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更重要的是,要将不断被激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有机融入国民教育、道德建设、文化创造和生产生活,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使之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和精神滋养。

在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要致力于建设文化强国,这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文化使命。这一过程,不仅关乎以复苏和升华,而我们的繁荣发展,更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维度,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

这为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提供了重要支撑。文化自信,来自对自身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的充分肯定。当我们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使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得以复苏和升华,而我们深厚的文化根基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我们就能更加坚定“走自己的路”的信心和底气。这种经由“结合”而增强的文化主体性,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这为破解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当今世界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的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之道,“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包容智慧,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淬炼和时代的发展,能够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深刻的思想启迪。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身就包含着对中华文明优秀基因的现代表达。

这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民族复兴离不开文化的繁荣兴盛,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从“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中汲取奋斗力量,从“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中激发创造活力,从“天下为公”的担当精神中砥砺家国情怀,这些被不断激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将汇聚成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磅礴力量。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它要求我们持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真理的理解和把握,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思考。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持续推进“第二个结合”的深度和广度,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的照耀下,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绽放出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芒,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参天大树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沃土、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责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编号:23BKS034)